

民为邦本：苏轼廉政思想的社会治理意义

刘欣琛¹

(1.眉山职业技术学院技师教育学院, 四川 眉山 620010)

摘要: 苏轼廉政思想主要包括清正廉洁、崇俭黜奢、去谀务实和抑苛恤民。在清正廉洁方面, 苏轼认为官员应拒绝贪污腐败; 在崇俭黜奢方面, 主张节俭生活、反对奢侈, 提倡“寓物而不留物”; 在去谀务实方面, 批判官员谄媚上级的行为; 在抑苛恤民方面, 反对朝廷和官吏剥削百姓, 主张减轻他们负担。在这四方面中, 清正廉洁是崇俭黜奢、去谀务实的思想根基, 崇俭黜奢是清正廉洁在生活作风上的具体表现, 去谀务实是清正廉洁和崇俭黜奢在政治实践上的体现, 三者最终又落脚于抑苛恤民, 以民为本。苏轼廉政思想对构建高效官僚体系、匡正官场奢侈之风、合理落实朝廷政策及减轻民众负担方面具有积极意义, 从而促进地方社会的有效治理。

关键词: 苏轼; 廉政思想; 社会治理

基金项目: 2024 年西华师范大学地方档案与文献研究中心项目“社会治理视角下的苏轼廉政思想研究”(编号 DAWXC2404) 成果; 2025 年眉山市社会科学研究高校专项课题“东坡文化创造性转化的研究与实践——基于生成式 AI 的东坡诗词研学盲盒设计与开发”(眉社联发〔2025〕10 号) 成果。

DOI: doi.org/10.70693/rwsk.v1i9.1358

“为政之要, 惟在得人。用非其才, 必难致治”。^[1]在宋代社会治理中, 地方官吏是主体, 因此他们的政治素养, 特别是廉政素养成为影响治理效果的一个重要因素。然而, 宋代地方官吏却存在着贪污腐败、生活奢侈、迎合朝廷需求、讨好上级官员和压榨百姓等问题, 并且成为“宋代地方政治的主流和常态”。^[2]

苏轼是北宋时期的一位著名政治家。他既在朝廷担任过起居舍人、中书舍人、翰林学士知制诰等要职, 也曾任杭州、密州、徐州等地出任地方长官, 积累了丰富的政治经验, 形成了自己的廉政思想。²目前, 学界有关苏轼政治思想的研究已硕果累累, 但关注廉政方面的却不多。相关成果主要是阐述了苏轼廉政思想的内容、形成因素及其当代价值等³, 而较少从社会治理视角进行分析。因此, 本文从社会治理视角⁴出发, 结合儒家“义利之辩”、“节俭”、“理欲之辨”和“士志于道”等思想, 从清正廉洁、崇俭黜奢、去谀务实和抑苛恤民四方面阐述苏轼廉政思想及其对于北宋地方社会治理的意义, 从而在视角上推进苏轼廉政思想研究, 并为理解北宋地方社会治理问题提供一种新路径。

一、清正廉洁: 高效行政体系的廉政基石

苏轼重视官员的廉洁, 认为这关系着国家长治久安, 主张严惩贪腐官员。这是苏轼廉政思想的根基。清正廉洁是政府高效行政体系形成的廉政基石, 有利于官员有效履行职责, 确保社会的公平正义, 从而促进地方社会稳定。

苏轼在入仕前便已认识到廉洁是官员应具备的重要政治素质, 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嘉祐六年 (1061), 苏轼

作者简介: 刘欣琛 (1990—), 男, 硕士, 讲师, 研究方向为东坡文化。

² “廉政”主要指官员等权力行使主体在履职过程中做到清正廉洁、公正无私, 在政治上形成清明良好、不贪腐的风气。“廉政思想”内容则十分丰富, 包括官德修养、勤政为民、任人唯贤、吏治之道等。参见陈平《中国古代廉政思想研究》, 清华大学 2004 年硕士论文。本文所提的清正廉洁、崇俭黜奢、去谀务实属于官德修养范畴, 抑苛恤民属于勤政为民范畴。

³ 参见饶晓明、饶学刚《泉清靠自洁, 人正靠自廉——苏东坡的廉政思想与实践扫描》, 《黄冈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2 年第 1 期, 第 1-6 页; 饶学刚《苏东坡廉政思想与实践及其应时意义》, 《乐山师范学院学报》2020 年第 11 期, 第 1-10 页; 周奎生《苏轼的廉政实践及其内在自觉因素分析》, 《乐山师范学院学报》2023 年第 3 期, 第 1-19 页; 周裕锴《浅谈苏轼的廉政思想》, 《苏海观澜》,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24 年版, 第 10-16 页; 等等。

⁴ 本文的“社会治理”是指以州县地方政府为主导, 对其辖区内的社会秩序、民众生活等事务进行管理的过程。

指出：“每中年辄下明诏，使两制各举所闻。在家者能孝而恭，在官者能廉而慎。”^{[3]4950}在身居高位后，苏轼也不忘这一点。元祐初年，已任翰林学士知制诰的苏轼作《六事廉为本赋》强调“廉”的重要性：“事有六者，本归一焉。各以廉而为首，盖尚德以求全。官继条分，虽等差而立制；吏功旌别，皆清慎以居先。”^{[3]131-132}六事，即《周礼》中所载的廉善、廉能、廉敬、廉正、廉法和廉辨，都以“廉”为首。官吏们应明白“功废于贪，行成于廉”^{[3]132}，要做到“举其要兮，廉一贯之”。^{[3]132}古人治理国家以官员廉洁为基础，而这也使国家治理变得简明，“先责其立操，然后褒其善理。是以古者之治，必简而明，其术由此”。^{[3]132}

苏轼对廉洁官员多有赞赏，而对于贪腐官员则主张严惩。张田在给他妹妹的信中提到，广州有许多真珠、香药，也有闲钱，但他作为市舶使，不想效仿前人自污。张田感慨，在唐代三百多年的历史中，只有宋璟、卢奂和李朝隐在治理广州时以廉洁著称，但如今还没有这类人，而他现在正在建钦贤堂，把古代清廉刺史绘在堂上，日夜思慕敬仰他们。《宋史》记载，张田“临政以清”，他的妹夫马军帅王凯想在广州贩卖珠犀，但遭到张田拒绝。他说南海地区物产丰富，但自己身为市舶使“不欲自汙尔”^{[4]10707}，可见其廉洁。苏轼由此感慨“洁廉，哲人之细事也，而古今边患常生于贪。守边得廉吏，则夷夏人安”。^{[3]7435}反之，苏轼十分痛恨贪腐之人。元祐元年（1086）四月，苏轼上奏弹劾陈绎，陈述其贪腐罪行：其一，擅自索取市舶库乳香“斤两至多”^{[3]3044}；其二，“外买生羊寄屠行，令供肉”^{[3]3044}，共计亏损了三十七贯钱；其三，私自将州宅的一尊檀木观音“绎别造杉木胎者，货易入己”^{[3]3044}，共亏损官钱二贯文，“系自盗赃一匹二丈”。^{[3]3044}陈绎后被降职知建昌军。苏轼对此不满，认为“绎资性倾险，士行鄙恶，当时所犯，自合除名”^{[3]3044}，这一任命已引起公议，现在朝廷还要重用他，“非惟必致人言，亦恐奸邪复用，其渐可畏”^{[3]3044}，“既以贷其除名，今复与之大郡，将使贪墨无耻，复蠹究民；非朝廷为民设官、慎选守长之意”^{[3]3045}，体现了他对贪官的痛恨。元祐八年（1093），苏轼知定州时发现了军中贪腐问题。甲仗库子军人张全在一年之间先后盗取铜锣十二面，“监官明知，并不申举”^{[3]3595}；帐设什物库子军人田平等在两年之间盗取八百余件帐设什物，二百五十余两银，“恣意典卖”。^{[3]3595}苏轼对此大力整顿，将贪污军人张全、田平等“皆以付狱按治”。^{[3]3596}苏轼又发现诸营点检营房损坏，“诸营军号，例皆暗蔽，妻子冻馁，十有五六”^{[3]3596}，原因在于“将校不法，乞取敛掠，坐放债负。身既不正，难以戢下，是致诸军公然饮博逾滥”。^{[3]3596}这导致禁军们无不贫困，“轻生犯法，靡所不至”。^{[3]3596}苏轼认为，“若不按发其太甚者，无以警众革弊”^{[3]3596}，最后查处了云翼指挥使孙贵。^{[3]3596}

苏轼清正廉洁思想源于儒家思想中的“义利之辨”。就“利”而言，儒家肯定了追求富贵是人的本性，但同时强调富贵应该是以正当途径所获得，人不应接受与道义不符的富贵。《论语》：“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5]70}，“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5]97}就“义”而言，儒家反对见利忘义，强调义先于利。《论语》：“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5]73}《荀子》：“先义而后利者荣，先利而后义者辱”。^{[6]32}苏轼重视廉洁且认为这关乎着国家长治久安便是“义利之辨”的一种具体表现，即主张官员应优先重视“义”，即履行好自己的职责，不接受不义之财，做到清正廉洁，使国家得到有效治理、百姓安稳。

北宋时期地方官员贪腐问题严重。如包拯指出，“逐路转运使，累有体量到州县长吏等，其间不才贪猥之尤甚者……况幅员至广，官吏至众，黠货暴政，十有六七”。^[7]哲宗时“廉吏十一，贪吏十九”。^[8]从社会治理角度而言，地方官吏贪腐不仅会导致公权力滥用、社会不公，还会因资源分配不合理等问题而使官僚履职效能低下，不利于地方社会治理。反之，官员廉洁则能减少腐败现象，提高官员履职效率，促进社会公平，进而增强民众对地方政府的信任，减少百姓与官府之间矛盾，从而有助于社会稳定和谐局面的出现。

宋代官吏贪腐问题的产生与朝廷重文抑武、优待士大夫的政策有关。一方面，这使士大夫逐渐形成了重节义的道德观和以天下为己任的社会责任观，苏轼重视廉洁便是这种风气的一个具体表现。另一方面，帝王对士大夫的优待、宽容也逐渐变成了对官员腐败的纵容。正如贾芳芳所言：“就宋代而言，‘为与士大夫治天下，非与百姓治天下也’的治国原则，优待官员、士人，官员贪污后处罚不严，更是地方官场贪官众多的原因。”^{[2]105}

二、崇俭黜奢：官场风气的廉政匡正

苏轼反对奢侈生活，认为应寓物而不留物、生活节俭，具体表现在对朋友王诜和姻亲蒲传正的劝告上。这正是清正廉洁在个人生活修养层面上的具体表现。这对官场的奢侈之风形成了匡正，有利于减少官员贪腐、盘剥民众等问题，促进官民关系的协调，从而实现社会的稳定。

苏轼的好友王诜热衷于书画，为此专门建了宝绘堂，将自己所获得的法书名画贮藏其中。苏轼知道后作《宝绘堂记》劝告他：“君子可以寓意于物，而不可以留意于物。寓意于物，虽微物足以以为乐，虽尤物不足以以为病；留意于物，虽微物足以以为病，虽尤物不足以以为乐。”^{[3]1122}为了说服王诜，苏轼举了四个例子：“钟繇至以此呕血发冢，宋孝武、王僧虔至以此相忌。桓玄之走舸，王涯之复壁”。^{[3]1122}钟繇曾与曹操、邯郸淳、韦诞、孙子荆和关枇杷等人讨论笔法，“因见蔡邕笔法于诞，苦求不与，痛恨呕血”，被曹操救起，后“诞死，繇令人发其墓，遂得蔡氏法”。^[9]王僧虔是南朝著名书法家，因宋孝武帝“欲擅书名”而不敢显露自己高超的书法水平，“常用掘笔书，

以此见容”。^[10]东晋桓玄造一艘船来装载他的衣服、书画等物品，他在面对别人的劝告时说：“书画服玩既宜恒在左右，且兵凶战危，脱有不意，当使轻而易运”^{[11]2592}，可见其轻重不分，过分看重身外之物。唐文宗时，王涯之已年过七十，仍贪恋权位，与李训等人为伍，结果不能审时度势而导致家族覆灭，其收藏的大量书画最终为人丢弃。因为过分贪恋外物，钟繇、王僧虔、桓玄和王涯之都“皆以儿戏害其国，凶其身”。^{[3]1122}苏轼还以自己为例，告诉王诜要看轻物才能避免病态地沉溺其中。“始吾少时，尝好此二者”^{[3]1122}，害怕失去家里所拥有的名家书画；担心他人不把他所拥有的书画给我。然而，轻富贵而重书法、轻生死而重画作，这难道不是颠倒错乱，失去了本心了吗？此后，自己看到喜欢的书画会积蓄起来，但被人取走了也不会再感到可惜。“于是乎二物者常为吾乐而不能为吾病”。^{[3]1122-1123}宋人李冶对此评论：“若东坡所论，真所谓寓物而不留物者也。然《乌台诗案》所载款状，与晋卿往还者，多以书画为累，是岂真能忘情者哉？”^[12]可见苏轼虽在劝诫王诜“寓物而不留物”，然而自己却也不能完全做到。但从另一个角度看，这至少说明苏轼在内心上认同“不可以留意于物”观念，因此才对朋友真诚地加以勉励。

苏轼劝告蒲宗孟不要奢侈生活。蒲宗孟，字传正，其姐为苏轼堂兄苏不欺之妻。《宋史》载：“宗孟趣尚严整而性侈汰”^{[4]10572}，每天要剖十只羊、十头猪，放三百支燃烛到郡舍。有人请求减少一些，他竟说你想让我坐在昏暗的室内忍饥挨饿吗？蒲宗孟的日常盥洁分为小洗面、大洗面，小濯足、大濯足和小大沐浴，“每用婢子数人，一浴至汤五斛”^{[4]10572}，生活之奢侈可见一斑。苏轼劝他应慈、俭：首先，从利害角度出发，认为蒲宗孟应在今天及早准备“归老之计”，毕竟在退居之后决不能粗衣淡食、闭门谢客，还需应对贫苦亲友，对这些事岂能没有准备；其次，从个人角度出发，说近年来自己将书画奇物视作粪土；最后，从亲情角度出发，“且看公亡甥面，少留意也”。^{[3]6582-6583}由上可见苏轼的用心良苦和反对奢靡生活的态度。

苏轼这一思想源于儒家“节俭”和“理欲之辨”等观念。就“节俭”而言，在儒家看来，“俭”是一种个人美德。《论语》：“子贡曰：‘夫子温、良、恭、俭、让以得之。夫子之求之也，其诸异乎人之求之与？’”^{[5]51}孔子及其弟子重节俭而轻奢侈。《论语》：“奢则不孙，俭则固。与其不孙也，宁固。”^{[5]102}“礼，与其奢也，宁俭”。^{[5]62}此外，“俭”还与君王治理国家关系密切，这是贤君的一种良好品质，能使之有节制地向民众征税。《孟子》：“贤君必恭俭礼下，取于民有制”。^{[5]257}就“理欲之辨”而言，儒家对此所持观点是“以欲从理”、“以理导欲”。^[13]一方面，孔子、孟子、荀子等一方面不反对人的欲望，如《论语》中提到“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5]70}，“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5]96}《孟子》认为“好色，人之所欲……富，人之所欲……贵，人之所欲”。^{[5]308}《荀子》指出：“饥而欲食，寒而欲暖，劳而欲息，好利而恶害，是人之所生而有也”。^{[6]35}另一方面，他们又主张要节制欲望。《孟子》认为“养心莫善于寡欲”。^{[5]382}《荀子》提出“以道制欲，则乐而不乱；以欲忘道，则惑而不乐”。^{[6]295}

北宋时期，官场盛行奢侈之风。如欧阳澈指出，一些官员“收拾金帛，制造器皿，已拟豪右。酣酒嗜音，夜以继日，惟恨腹隘而不能恣口于饮，力惫而不能肆情于色。至于听讼理民，则偃蹇而不暇”。^[14]在这种风气影响下，官员们为维持这种生活会进一步中饱私囊、盘剥百姓，导致政府资金流失和官民矛盾加深。就此而言，苏轼崇俭黜奢的廉政思想，对北宋官场上盛行的奢侈之风构成了抵制，从而有助于遏制官吏贪腐和压榨民众的行为，维护官民关系，从而促使社会稳定。

三、去谏务实：政策执行的廉政保障

清正廉洁能使官员不贪图钱财，崇俭黜奢则使官员不会为追求政绩而不顾一切。这两种思想的结合能使官员在政治实践中不为功名利禄所诱惑，也不会因此而极力讨好朝廷、上级，从百姓利益出发来合理执行朝廷政策，从而实现去谏务实。苏轼正是基于这一理念，认为官吏应从民众利益出发来治理地方，而不应该趋炎附势、攀附权贵，不顾地方实际情况来迎合朝廷或上级官员的需求。这一思想有助于避免朝廷政令的扭曲而使百姓受害。

苏轼任地方官时，对官员为迎合朝廷要求而不顾百姓死活问题有着深刻认识。元祐四年（1089），杭州遭遇旱灾、水灾，时任杭州知州的苏轼积极抗击灾害、救济灾民。在这个过程中，他发现一些官员为了免遭朝廷指责而不顾百姓死活的行为，如催缴赋税，“转运司来年合发上供额斛及补填旧欠共一百六十余万硕。本路钱物，大抵空匮，划刷变转不行，官吏急于趁办，务在免责，催迫赋租，督促欠负，钐束私酒漏税之类，必倍于平日”^{[3]3264}；为确保上供米而余米，“又缘上供额斛数日至广，都无有备。见今逐州广行收余，指挥严紧，官吏不免遮拦，米谷添价贵余”^{[3]3264}，导致“以此斛斗涌贵，小民乏食”。^{[3]3264}北宋时期，向中央上供钱物是地方政府的任务之一。官员们为完成任务、讨好朝廷，即便是在荒年也强行向民众征收粮食和赋税，结果给他们带来沉重灾难。如皇祐三年（1051），包拯指出，江、淮六路连年大旱，百姓困苦，而州县却仍在余粮，结果“父子惶惶，相顾不救，老弱者死于沟壑，少壮者聚为强盗，不幸奸雄乘间而起，则不可制矣”。^{[15]4119}苏轼批判了这些官吏为谋取政绩而不顾民生的行为。

苏轼在史评文章中，以谄媚权势与否作为标准来评判历史人物，从而表达自己反对官员趋炎附势的观点。如他感慨“西汉风俗谄媚”，不受此风气影响的人只有汲黯。苏轼赞扬司马迁“至伉简”，但认为他“然作《卫青传》，不名青，但谓之大将军……此等语甚可鄙”。^{[3]7217}在苏轼看来，司马迁不应该将卫青这样的趋炎附势之徒尊称为大将军。同样，他也认为贾谊也不该说出“爱幸于河南太守吴公”^{[3]7217}的话。这些情况都是“习俗使然也”。^{[3]7217}苏轼对司马相如也持恶评，认为他“开创西南夷逢君之恶，以患苦其父母之邦”^{[3]7220}；其《谕蜀父老》本来是用于劝谏天子的，但如今看来，这篇文章不仅没有起到劝谏的作用，反而是在引导君王犯错，“谄谀之意，死而不已，犹作《封禅书》。如相如，真可谓小人也哉！”^{[3]7222}类似的史评文章还有不少。如苏轼谈裴頠：“晋武帝探策，当亦如签也耶？惠帝探策得一，盖神以实告。裴頠谄对，士君子耻之，而史以为美谈，鄙哉！惠、怀、愍皆不终，牛系马后，岂及二王乎？”^{[3]7267-7268}苏轼所提的裴頠应为裴楷。晋武帝登基后，以探策来占卜世数，结果“得一”。

这导致皇帝不高兴,群臣也不敢说话。在此情况下,裴楷说:“臣闻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王侯得一以为天下正。”^{[11]1048}结果“武帝大悦,群臣皆称万岁”^{[11]1048},裴楷也得到升官。在苏轼看来,晋武帝探策得一,意味着国家存在覆亡的危机,但裴楷没有为皇帝提出治国良策,而是谄媚他,没有尽到一个大臣敢于谏言的职责。此外,《褚遂良以飞雉入宫为祥》、《王韩论兵》等文章都表达了相同的观点。

有人认为,“苏轼对武将的评价观念是深受自宋以来朝廷重文轻武的政策和观念影响,而且这种评价观点也不符史实”,“苏轼评述历史人物只看到人品的劣根性而对人物的功绩一概抹杀,且论述人物多以臆测为主,没有史实依据”。^[16]尽管如此,这些评论反映出了苏轼对于士大夫理想品质要求——拒绝谄媚上级和趋炎附势。更重要的是,这也是苏轼对士风的现实关怀,“本朝太宗时,士大夫亦有此风,至今未衰”。^{[3]7217}在北宋太祖、太宗和真宗时期,北宋士风在整体上比较低沉、颓废,趋炎附势的人不少。苏轼的史评正是他对当前官场上谄媚之风不满的体现。

苏轼这一思想源自儒家“士志于道”精神。当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登上历史舞台之际,孔子便为他们注入了一种理想主义精神,即能超越自己与群体的利害得失,深切关怀社会。《论语》强调,“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5]71},“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5]104}“君子谋道不谋食……君子忧道不忧贫”。^{[5]168}不仅如此,儒家还认为“道”尊于“势”,“古之贤王好善而忘势,古之贤士何独不然?乐其道而忘人之势。故王公不致敬尽礼,则不得亟见之。见且由不得亟,而况得而臣之乎?”^{[5]358}因此,中国古代知识分子不仅不该依附权贵,还应根据“道”的标准来批判政治社会。

北宋时期官吏迎合朝廷、讨好上级的风气盛行。如熙宁变法时,“为守令者奉命唯恐后”^{[4]12713},程珦独自对此抗议,“指其未便。使者李元瑜怒,即移病归”。^{[4]12713}二浙地区发生旱灾时,负责查看灾情的官吏“承监司风旨,不敢多除税”。^{[4]10941}时任润州推官的王觐接到官文后再次核查,发现灾情严重,于是将百姓税赋全部免除,结果“监司怒,捃摭百出”。^{[4]1094}由此可见,地方官吏极力迎合上级要求,若非如此便会遭到报复。司马光指出,尽管国家遭遇旱灾,“中户以下,大抵乏食,采木实草根,以延朝夕”^{[17]969},但州县官吏们却仍在“督迫青苗助役钱,不敢少缓”^{[17]969},结果“妇子皇皇,如在汤火之中,号泣呼天,无复生望”。^{[17]970}司马光批判了那些为迎合朝廷政令而不顾百姓死活的州县官吏,同时也认为“彼阿谀之人附会执政者,皆缘新法以得富贵”。^{[17]971}

就社会治理而言,地方官员为向朝廷或上级邀功,会不顾地方具体情况来执行朝廷政令,或不顾百姓生活满足上级需求。这容易使中央政策在地方上执行时被扭曲,加重百姓负担,激化社会矛盾。因此,苏轼反对官员抵制政治投机的思想有助于构建一个健康、讲求实效的官僚体系,使官员们能实事求是,站在百姓而非个人利益的立场上行动,从而使朝廷政策穿透官僚主义的层层扭曲直达基层,维护百姓的利益。

四、抑苛恤民:社会稳定的廉政基石

苏轼认为民众是天下的根本。同时,民众是参与社会治理的主体之一,官府处理好与他们的关系有利于实现地方社会的有效治理。苏轼反对朝廷和地方政府剥削百姓、与民争利,主张应体恤他们。这有助于减少官民矛盾,增加民众对政府的认同,从而实现社会的稳定。同时,这也是清正廉洁、崇俭黜奢和去谀务实思想的旨归。

在入仕前,苏轼便注意到了官吏搜刮民众的现象。他在《策别安万民一》中指出,朝廷要让民知信、义,应该“务实其言”、“去其贪”。但如今是朝廷不讲信义,而且官吏贪婪:“今鸡鸣而起,百工杂作,匹夫入市,操挟尺寸,吏且随之而税之,扼吭拊背,以收丝毫之利……今之设官者,求以胜民”。^{[3]835-836}朝廷为求利,将天地之间凡是可搜刮的东西都设立了禁令,结果“民日趋于贪”。^{[3]836}北宋朝廷为缓解财政压力,实行专卖制度,对盐、茶、酒、矿等实行榷禁,甚至强制百姓购买榷禁商品,逼得百姓悲叹不已,不得不放弃家产转移,甚至成为盗贼。苏轼看到了百姓疾苦,反对官吏搜刮他们,认为官府贵在不与民争利,“夫所贵乎县官之尊者,为其恃于四海之富,而不争于锥刀之末也。其与民也优,其取利也缓”。^{[3]836}苏轼强调,朝廷应“可取之利,当有所不取”,即减少对百姓的掠夺。这样才能“以教民信,而示之义”^{[3]836},“若曰‘国用不足而未可以行’,则臣恐其失之多于得也”。^{[3]836}

苏轼在凤翔府任职时,通过改革衙前役和酒税,减轻百姓负担,增加他们的收入。他发现民众最畏惧衙前役。衙前役是差役的一种,在不同地区有着不同的职役,“在全国范围内的衙前役,所承担的职责也有所不同”。^[18]凤翔地区民众衙前役的内容主要是将砍下的南山之木编为木筏,装上货物并放进渭水,使之经三门峡运至开封,如有损失,负责押运的差户就要赔偿。苏轼发现问题主要在于“患其乘河渭之暴,多方害之耳”^{[19]215},于是修改规定,“使衙前得自择水工,械行无虞”^{[19]215},此后“衙前之害减半”。^{[19]215}苏轼还请求朝廷改革酒税,官榷与民。他在奏折中指出,在宝元以前,“秦人之富强可知也”^{[3]5231},然而“一经元昊之变,冰消火燎,十不存三四”。^{[3]5231}元昊之变即宋仁宗宝元元年(1038),李元昊称帝,并于当年七月攻破庆州的事件。此后,在康定元年(1040)、庆历元年(1041)、庆历二年(1042),西夏在陕西地区发起了三次进攻,大败宋军。西夏的进攻给北宋民众带来了巨大损失。如庆历元年(1041)八月,西夏攻破宁远寨。“纵兵四掠,刈禾稼,发窟藏”。^{[15]3163}而巨大的军费支出也给百姓带来灾难,“自西陲用兵以来,国帑虚竭,民间十室九空”。^{[15]3633}因此,“今之所谓富民者,向之仆隶也;今之所谓蓄聚者,向之残弃也”。^{[3]5231}苏轼认为,要对付西夏应让百姓平时休养生息,以防战乱。苏轼的见解很合理,因为百姓的穷困引发了农民起义。“西鄙用兵以来,骚动天下,物力穷困,人心怨嗟。朝廷不能抚存,遂使为盗”。^{[15]3450}若不减轻百姓负担,使之得到恢复,恐怕外患未平内患又起。因此,苏轼希望朝廷能改革酒税,“官榷与民”,并算了一笔账:每年因放弃酒课而损失的二万贯钱可以通过税收弥补,即便是这些钱都损失了,朝廷也可以通过转运使实现均多补少,“要以共足”。反之,若民众日益贫困且得不到诉说,突然发起变乱,那么即便朝廷每年能得钱千万也无法解决好这个问题。^{[3]5231}苏轼通过计算利弊得失,希望能说服朝廷。苏轼最后说:“方今山陵事起,日费千金,轼乃于此时议以官榷与民,其为迂阔取笑可知矣。”^{[3]5232}嘉祐八年(1063)三月,

宋仁宗驾崩。宰相韩琦出任山陵使，负责修筑陵墓，命令苏轼将凤翔地区的贵重木材送往陵地。在朝廷急需用钱的时候，苏轼却提出“官榷与民”确实显得“迂阔”，但也体现了他心系民众，急于为他们减轻负担的态度。

苏轼知扬州时，发现当地每年举办的万花会给百姓带来了巨大的负担。万花会“用花十余万枝。既残诸园，又吏因缘为奸，民大病之”^{[3]8206}，于是苏轼将其罢去。他认为：“万花会本洛阳故事，而人效之，以一笑乐为穷民之害。意洛阳之会，亦必为民害也，会当有罢之者。”^{[3]8206}关于洛阳和扬州花会，宋人笔记载，洛阳牡丹名闻天下，太守在花盛开时举办万花会，“宴集之所，以花为屏帐，至于梁、栋、柱、拱，悉以竹筒贮水簪花钉挂，举目皆花也”。^{[20]239}蔡京知扬州时也举办万花会，此后“岁岁循习而为，人颇病之”。^{[20]239}苏轼取消花会后，“人皆鼓舞欣悦”。^{[20]239}赏花是北宋时期士大夫日常生活中一种稳定、习惯的休闲方式。苏轼也有此喜好，并写了《牡丹记叙》、《吉祥寺赏牡丹》、《吉祥寺花将落而述古不至》等作品。但在苏轼心中，牡丹花再美也比不过减轻百姓负担。

苏轼思想与儒家“民本”和“仁政”理念有关。儒家高度重视民众，如《孟子》指出：“诸侯之宝三：土地，人民，政事。”^{[5]379}君王要称王天下，便应乐民、忧民。“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5]219}想要得天下便要先得民心，“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与之聚之，所恶勿施尔也”。^{[5]285-286}儒家主张行“仁政”，认为统治者应该使民众富裕，《论语》：“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5]136}要做到这一点，统治者就应该轻徭薄赋。《孟子》：“省刑罚、薄税敛”^{[5]206}，“取于民有制”。^{[5]257}反对统治者苛待民众。《孟子》：“庖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莩，此率兽而食人也。兽相食，且人恶之。为民父母，行政不免于率兽而食人，恶在其为民父母也？”^{[5]205}

有宋一代，财政紧张的问题始终困扰着朝廷。为了解决这一问题，中央持续压榨地方，而地方政府为了解决自身的经济问题又只能搜刮百姓，“鱼肉百姓成为了当时比比皆是的地方官府常态”。^{[2]180}如地方政府为满足朝廷的财政需求而争向朝廷进献羡余。羡余，即地方政府在额定上供之外向中央上缴的财物，其本质实为“非重征则横敛，是民之膏血也”。^{[4]11820}皇祐三年（1051）八月，江南西路转运使、司勋郎中刘纬因被台谏弹劾“庸懦不职，方饥而剥下以收羡余”^{[15]4150}而被徙为庐州知州。王质任湖北路转运使时，正值朝廷对西夏用兵，急需钱财，而他“独不进羡余，其赋敛近宽平，治以常法。故他路不胜其弊，而荆湖之人自若”^{[12]1}，可见进献羡余是地方政府的普遍行为，体恤百姓的官员是少数。此外，民众还要承受各种名目的赋役，官吏的各种巧取豪夺，官吏帮助地主转移的赋税等。^{[2]180-198}地方政府的过度压榨使民众生计维艰，容易激化社会矛盾，引起盗匪横行、民变，导致地方社会治理的成本大幅度上升，进而使政府不得不投入更多的资源，最终不利于地方社会的建设。就此而言，苏轼抑苛恤民的思想有利于缓和社会矛盾，使百姓生活安定，减轻地方政府维护社会秩序的负担，是社会稳定的基石。

结语

苏轼廉政思想主要包括四点：一是清正廉洁，反对官员贪污腐败。二是崇俭黜奢，主张寓物而不留物和节俭生活，反对官员奢侈生活。三是去谏务实，批评官员谄媚上级、迎合朝廷需求的行为，主张从百姓利益出发来执行朝廷政策。四是抑苛恤民，反对朝廷和地方官员剥削百姓，认为应减轻他们的负担。这四个方面相互支撑、互为表里，其中清正廉洁是崇俭黜奢、去谏务实和抑苛恤民的思想根基；清正廉洁使官员在生活上崇俭黜奢；清正廉洁、崇俭黜奢则有助于培养官员淡泊名利的道德品格，从而减少他们因私利而迎合上级的动机；清正廉洁、崇俭黜奢和去谏务实有利于地方政府减少财政支出、减轻民众负担，最终实现抑苛恤民。这些思想有助于建立一个高效的行政体系，匡正官僚体系中的奢侈风气，使朝廷政策合理执行，减轻百姓负担，从而实现地方社会的有效治理。

贾芳芳认为，在宋朝，“在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体制下，官员选任与管理的首要目的，是维护皇权加强中央集权。在此前提下选任的各级地方官，或一心媚上，或一意谋私，完全不顾百姓的感受……尽管有少量清官，他们身体力行儒家的教育，以清廉形象施政，却根本不可能扭转官场昏天黑地的大气候……地方政治的黑暗与暴虐，正是根源于专制主义中央集权下的等级授职制，具有必然性。”^{[12]223-225}尽管如此，我们也能从苏轼廉政思想中看到他突破了对皇权的依附，超越了“专制主义中央集权下的等级授职制”影响。而这种超越既源自儒家“义利之辩”、“民本”、“仁政”“士志于道”等精神，也是北宋时期士大夫政治主体意识觉醒，形成“以天下为己任”集体意识的历史产物。虽然苏轼等士大夫虽无力从根本上改变专制集权体制带来的腐败生态，但他们对这种败坏风气的对抗彰显出了士大夫精神的可贵，也为后世提供了如何在腐败环境中坚守廉洁的生动范本。

参考文献：

- [1]吴兢.贞观政要[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219.
- [2]贾芳芳.宋代地方政治[D].保定：河北大学博士论文，2009.
- [3]张志烈等主编.苏轼全集校注[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10.
- [4]脱脱等.宋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7.
- [5]朱熹.四书章句集注[M].北京：中华书局，2012.
- [6]张觉.荀子译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
- [7]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第13册）[M].成都：巴蜀书社，1990:311.
- [8]陆心源.宋史翼[M].北京：中华书局，1991：68.
- [9]邓安生.蔡邕集编年校注（下）[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578.

- [10]萧子显.南齐书[M].北京: 中华书局, 2017:656.
[11]房玄龄.晋书[M].北京: 中华书局, 1996.
[12]周必大.玉堂杂记校笺[M].西安: 陕西人民出版社, 2018:9.
[13]任松峰.儒家廉德思想研究[D].曲阜: 曲阜师范大学博士论文, 2015:48.
[14]黄淮撰, 杨士奇辑.历代名臣奏议, 明永乐十四年内府刻本.
[15]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M].北京: 上中华书局, 1985.
[16]韦正春.苏轼史评论[J].惠州学院学报, 2020 (1) :81.
[17]司马光.司马光集[M].成都: 四川大学出版社, 2010.
[18]漆侠.漆侠全集 (第 8 卷) [M].保定: 河北大学出版社, 2009:(145).
[19]曾枣庄, 舒大刚.三苏全书 (第 18 册) [M].北京: 语文出版社, 2001.
[20]张邦基.墨庄漫录[M].北京: 中华书局, 2002.
[21]欧阳修.欧阳修集编年笺注 2[M].成都: 巴蜀书社, 2007:205.

The people are the foundation of the country: The social governance significance of Su Shi's thoughts on clean government

Liu Xincheng¹

¹ *School of Technician Education, Meishan Vocational and Technical College, Meishan, Sichuan*

Abstract:Su Shi's thoughts on clean and honest government mainly include being honest and honest, advocating frugality and removing extravagance, eliminating flattery and pragmatism, and restraining harsh people. In terms of integrity and integrity, Su Shi believed that officials should refuse corruption; in terms of advocating frugality and removing extravagance, he advocated frugal living and opposed extravagance, and advocated "retaining things without leaving things"; in terms of de-flattery and pragmatism, he criticized officials for flattery and flattery; in terms of curbing harsh and caring for the people, he opposed the court and management exploiting the people and advocated reducing their burden. Among these four aspects, integrity and integrity are the ideological foundation of advocating frugality and removing extravagance, and eliminating flattery and pragmatism. Promoting frugality and removing extravagance is a concrete manifestation of integrity and integrity in life style. Eliminating flattery and pragmatism is the manifestation of honesty and integrity and advocating frugality and removing extravagance in political practice. The three ultimately settled on suppressing harsh and caring for the people and putting the people first. Su Shi's thoughts on clean government have positive significance in building an efficient bureaucratic system, rectifying the extravagant style of officialdom, rationally implementing court policies, and reducing the burden on the people, thereby promoting effective governance of local society.

Keywords:Su Shi; clean government thought; social governance